

内蒙古近代史论丛

第一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7
2

内蒙古近代史论丛

第一辑

中共内蒙古地区党史研究所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呼和浩特

内蒙古近代史论丛

第一辑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史研究所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凉城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25 字数：235千

1983年1月第一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册

统一书号：11089·47 每册：0.95元

前 言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一个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殖民地社会。内蒙古地区也相应地发生着这种变化。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内蒙古地区发生过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变，这期间的历史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然而不论是国内史学界，还是外国史学界，或是蒙古史研究工作者，对内蒙古地区的近代史还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可以说它还是中国近代史乃至蒙古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因此，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大力开展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非常紧迫的任务。

内蒙古近代史也和全国一样，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两个大的历史时期。这里的近代历史有与全国相同的内容，也有它自身的特点。内蒙古地区和全国一样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又有与全国不同的内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侵略从商品输出开始，发展到资本输出，乃至划分势力范围，但其侵略的主要特点是从民族问题入手，煽动民族分裂，策划“独立”“自治”，进而企图吞并内蒙古。这也可以说是帝国主义侵略内蒙古的宗旨。伴随这种政治企图而进行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也带有与内地明显不同的特点。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内蒙古地区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内蒙古各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蒙汉各族人民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成为内蒙古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日趋尖锐，不可调和。所以，在近代，内蒙古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从未间断，而且越来越高

涨。早在鸦片战争中，蒙古民族有着光荣的反英法侵略者的业绩；在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三大革命高潮中，内蒙古地区都有积极的反响。历史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后，蒙汉各族青年积极投入了五四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内蒙古地区的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内蒙古成为党最早开辟工作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以后，不论在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全国大革命高潮中，还是在艰苦曲折的土地革命时期，不论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还是在中国革命大决战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领导内蒙古各族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伟大斗争，夺取了内蒙古革命的最后胜利，创造了千古永存的光辉业绩和丰富多彩的斗争经验。这是内蒙古历史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最值得赞颂的时期。所以，光是近代内蒙古革命斗争历史的研究课题也是非常广泛的。

当然，内蒙古近代史上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诸如清朝末年以及北洋军阀、国民党对内蒙古的政策，内蒙古的民族运动，内蒙古盟旗制度的演变，内蒙古地区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土地问题以及农牧关系问题，内蒙古近代经济、文化史，以及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等，都需要从头开始进行系统的研究。

为了推动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为了对中国近代史补充必须的内容，也为了给史学工作者和史学爱好者提供参考读物，我们汇编了《内蒙古近代史论丛》，可望达到预期的效果。

《论丛》第一辑共收入九篇论文，其中有些文章系统地论述了民主革命时期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有些文章对内蒙古近代史上的重要问题进行了专题论述，所论及的问题绝大多数是第一次提出，这些论文的作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利用大量的文献档案资料和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对所提出的课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有些文章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对于教学和科研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在目前尚无一部较为完整的内蒙古

近代史专著的情况下，可作为学习内蒙古近代史的重要参考书。但是，由于编者的水平所限，差错之处也在所难免，深望史学界同志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特 布 信

目 录

前言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内蒙古人民的革命斗争

.....黄时鉴 特布信 郝维民(1)

西方殖民者在河套鄂尔多斯等地的罪恶活动

——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国的一个实例...戴学稷(59)

论清末清政府对内蒙古的“移民实边”政策.....黄时鉴(106)

伊克昭盟“独贵龙”运动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郝维民(128)

辛亥革命时期呼包地区的起义斗争.....戴学稷(169)

辛亥革命时期内蒙古的民族运动.....史 筠(196)

“五四”到“五卅”时期呼和浩特反帝爱国运动

史实札记.....郝维民(227)

李大钊与内蒙古革命.....郝维民 其其格(241)

关于“伊盟事变”.....黄时鉴 张思成(263)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内蒙古人民的革命斗争

黄时鉴 特布信 郝维民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内蒙古的社会面貌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起，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内蒙古的社会面貌同我国内地一样，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封建社会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首先是从东南沿海一带侵入中国的。内蒙古地处北边，所以内蒙古社会因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而引起的变化，在近代初期发生得比较晚些，发展得比较慢些。大致是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内蒙古才受到西方列强的重视，特别是受到资本主义正在发展起来的北边邻近内蒙古的沙皇俄国的重视。自从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遭到失败，沙俄便看到清政府的腐朽，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沙俄扩张主义分子即已拟订出侵略蒙古地区的计划。从1860年起，俄国商人开始依仗沙俄在中俄北京条约中所获得的在蒙古贸易的特权，到内蒙古经商。八十年代初，俄商的活动即已达到内蒙古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与此同时，英、法、美、德等国商业势力也纷纷侵入内蒙古争一席之地。九十年代后期，东方新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更竭力在内蒙古扩张势力，并同其他列强，首先是在这儿势力较大的沙俄，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下，内蒙古逐步变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推销市场和原料掠夺基地。

内蒙古的商业贸易原来是长期掌握在汉族旅蒙商^[1]手中的。

但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使旅蒙商遭到严重的打击以至于破产。有一部分旅蒙商逐渐转化成为洋行的买办，代表外国资本的利益，对内蒙古人民实行残酷的商业高利贷剥削。

在外国资本主义商业势力侵入的同时，外国传教士也在内蒙古展开了积极的宗教侵略活动。外国传教士在内蒙古一面以宗教的毒素麻醉人民，一面占地立法，侵犯中国主权，渔肉蒙汉人民。他们在这里的一切作为，完全暴露了他们的侵略者面目。

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近代整个中国社会的变化，对于内蒙古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在近代内地农村破产、大量农业人口出关的情况下，在蒙古族王公为图私利而大量放地招垦的情况下，近代内蒙古牧区迅速缩小，农区、半农半牧区迅速扩大。特别是在内蒙古腹地出现了广大的半农半牧区，农牧业多种经济并存，蒙汉各族杂居。在半农半牧区，蒙汉各族的交往联系更加密切。但同时，这里处于社会经济的激烈变化中，各种社会矛盾往往集中地表现出来。农区、半农半牧区的扩大，促进了内蒙古区域内部农牧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这基础上，出现了更多中小城镇，进一步形成一定地区内的商业手工业中心。进入二十世纪后，这里并开始出现资本主义性质的工矿企业。这些经济变化，使内蒙古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复杂化和尖锐化了。

在封建特权阶级的残酷剥削下，加上牧区逐渐缩小，广大蒙古族牧民的牧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他们的生活急剧贫困化。有一部分牧民被迫逐渐转务农业，成为农民；但他们由于农业技术低下，并逃脱不了王公的剥削，因此同样十分困苦。蒙古族农牧民受到王公的差派剥削是异常沉重的。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支付历次对外赔款和对内战费而大量增加了对内蒙古王公的贡物贡银的要求；外国商品的输入和城镇里的奢侈生活大大刺激了王公的享受贪欲，为此需要大量银两；清末贿赂公行，王公为晋爵要捐献，为争夺袭爵或地界要诉讼，都需要大量银两；王公进京

值年班和清朝官吏出差内蒙古更是横加勒索，常年派驻内蒙古的文武官吏则更肆意搜刮。所有这些，最后都压到蒙古族农牧民（以及汉族农民等）的头上。王公支付不出种种巨款时，便向汉族商业高利贷者以至外国侵略者告债，但其债款却往往让高利贷者向农牧民索讨，或继续放地还债，这就使农牧民的灾难更为加重。

在农区和半农半牧区，有大量汉族农民。他们或他们的父辈祖辈都是因受不住内地的封建剥削而逃荒到内蒙古来的。他们为内蒙古带来了农业技术，并把它传授给蒙古族人民；他们也学习了蒙古族的牧业技术。但是，他们在这里依旧处于蒙汉地主或外国传教士的封建剥削之下。蒙古族王公对汉族农民更不仅进行一般的封建地租剥削，而且往往用对蒙古族人民同样的办法，进行封建特权剥削，任意摊派差款。因此，汉族农民和蒙古族农牧民处于同样悲惨的境地。

在城镇中，还有很多手工业者和小商贩，他们主要来自内地，也有部份来自内蒙古本地破产中的农村牧区。手工业者和小商贩也受到清朝官吏、蒙古族王公、封建把头、商业高利贷者的层层盘剥，生活贫困。

近代内蒙古的封建剥削阶级主要是蒙古族王公贵族、^[2]蒙古族地主和汉族地主、商业高利贷者。王公贵族仍是封建特权阶级，但已日趋衰落。地主阶级主要由蒙古族王公贵族、汉族商业高利贷者转化而成。近代内蒙古的不少王公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有的汉族地主占有的土地也是惊人的。此外，许多外国传教士也是大地主。蒙汉封建统治阶级对蒙汉劳动人民进行着种种封建剥削。其中特别是王公，依靠世袭的封建特权，对蒙汉劳动人民实行强制掠夺和政治压迫。王公是清朝在内蒙古统治的支柱，进入内蒙古的汉族地主、商业高利贷者又往往勾结王公而仗势剥削蒙汉人民；外国传教士更以勾结王公作为实行其种种侵略活动的手段，所以，近代内蒙古社会中的许多矛盾，都不同程度地集中反映在

王公身上。

台吉（包括塔布囊，下同）的变化很大。虽然有不少台吉还跟着王公的路子走，但是由于近代中下层台吉的普遍趋于衰微，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情况下，有一部分台吉与王公处于矛盾重重以至于对立的地位。有一部分台吉转化为地主、牧主，而另一部分台吉却转化成为自食其力的农牧业劳动者。新的阶级分化代替着旧的封建等级制度。在这些没落的台吉中，纵然不时有人回忆起先代的荣耀而不甘屈居平民的地位，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他们往往站到了劳动农牧民方面。

清朝用来麻醉蒙古族人民的喇嘛教，到了近代，在内蒙古，特别是在农区、半农半牧区，其影响开始削弱。除少数上层喇嘛依靠封建特权、占据大量土地财富而成为大地主、大牧主外，广大下层喇嘛遭受上层喇嘛的封建特权剥削，生活贫困。上层喇嘛是封建特权阶级的组成部分，而下层喇嘛其实是披着袈裟的农牧民。上下层喇嘛之间的对立斗争日益明显，并构成整个社会上层封建特权阶级和农牧民之间对立斗争的一部分。

总之，近代内蒙古社会的变化是巨大的，近代内蒙古社会的矛盾是尖锐复杂的。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内蒙古地区盗风日炽，控案繁兴，正是社会经济破产、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一个明显的征兆。

在阶级矛盾中交错着复杂的民族矛盾。一种是蒙汉各族同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民族矛盾，它的产生在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对内蒙古的侵略，这是近代内蒙古社会的主要矛盾。一种是蒙汉各族同满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它的产生在于满族封建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这个民族矛盾从清初以来即存在，而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它又转化成突出地表现为蒙古族与满汉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再一种是本地蒙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它集中表现在农牧矛盾上，而它的产生则在于蒙汉封建统治阶级对于蒙汉劳动人

民的交叉剥削，实质上也是阶级矛盾。显然，要解决这种种民族矛盾就必须蒙汉各族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外国侵略者，反对清王朝（辛亥革命后是北洋军阀），反对蒙汉各族的反动统治阶级。然而问题在于：长期以来处在反动统治阶级思想影响下的蒙汉各族劳动人民，虽然其根本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但是他们达到革命觉悟是不容易的；他们学会用自觉的阶级观点来剖析民族问题及其他种种社会问题，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近代内蒙古革命斗争中，民族问题始终是一个严重的谁也避不开的问题，革命斗争的实践成为蒙汉劳动人民共同学习阶级斗争和解决民族问题的课堂，成为检验各个阶级的民族观及其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政策、办法是否正确的场所。

归根结蒂，近代内蒙古社会存在着三个基本矛盾，就是内蒙古人民同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内蒙古人民同国内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内蒙古人民同内蒙古封建特权阶级的矛盾。这三大矛盾乃是近代内蒙古人民革命运动的根源。这里所指的内蒙古人民，其基本群众是蒙汉各族的劳动人民。蒙古族农牧民由于所受的压迫剥削特别惨重而具有强烈的革命斗争性。汉族农民、手工业者具有同样的革命斗争性，他们并因同内地农民、手工业者有密切联系而往往成为内地革命消息和斗争经验的传播者，成为近代中国革命高潮或邻近地区革命运动向内蒙古扩展的灵敏的传动带。由于蒙汉各族同外国帝国主义的矛盾是近代内蒙古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蒙古族封建上层中的一部分人，在自己的根本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也可能加入某些反帝爱国斗争；但是他们容易动摇和背叛，他们更不是这些斗争的主力。内蒙古蒙汉各族劳动人民乃是内蒙古近代史的主人，革命斗争就是他们创造内蒙古近代史的闪闪发光的工具。

二、十九世纪四十到九十年代内蒙古人民的 反帝反封建斗争

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华各民族人民的最主要的敌人。在外来侵略面前，中华各民族的命运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从两次鸦片战争时候起，内蒙古人民和蒙古族封建上层中的抵抗派人物就投入了鸦片战争前线的反抗外国侵略的正义斗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裕谦在浙江前线对英作战中勇敢坚毅并最后殉职，突出地表现了中华各民族在外来侵略面前的命运与共，表现了蒙古族誓死抵御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

裕谦（博罗忒氏），世居察哈尔地方，隶蒙古镶黄旗。他“推服林公（则徐）”^[3]，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旗员中少见的抵抗派人物。

1841年8月，当英国因不满足《川鼻条约》中的侵略权益而重新在东南沿海发动进攻时，裕谦正担任两江总督，在浙江镇海前线督战。他在前线努力激发士气，严阵对敌。并十分重视镇海、定海一带人民充满着同仇敌忾的情绪，“号召沿海渔、蛋、奥屿穷民，同心杀贼”^[4]，“镇海县城厢士民，按户各出壮丁一人，协同守御”^[5]。

6月25日，英军进攻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兵血战六昼夜后先后阵亡，定海失陷。英军接着向镇海进攻。镇海防兵仅四千，形势紧迫。裕谦除整军防卫外，一面请清政府迅速调兵援浙，一面“广募水勇团练乡民”^[6]，进一步把当地人民组织起来武装抵抗。同时，裕谦为安定军心，召集文武员弁，在神前宣誓：“……断不肯以退守为辞，离却镇海县城一步；尤不肯以保全民命为辞，接受逆夷片纸。”^[7]浙江提督余步云贪生怕死，心怀二志。余步云率领镇海防兵的一半驻守镇海城外的制高点招宝山。10月10日，英军全面进攻镇海，裕谦督军备战。

余步云临阵“两次请退守宁波，裕谦不许。”^[8]余步云于是独自弃战逃走。英军因此先占领招宝山阵地，俯攻镇海城。在镇海将陷之际，裕谦恪守誓言，投泮池自尽。

裕谦及其部下在浙江沿海的抗战，是抵抗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又一次英勇业绩。裕谦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中的反侵略志士的代表人物，最后以生命贡献给中华各族共同的反侵略斗争事业，他在我国近代史上更具有特殊的重要历史地位。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内蒙古各阶层还捐献马匹、银钱等支持前线的反侵略战争。据《清实录》的记载，有察哈尔官兵捐马3,600匹，察哈尔叶古则尔呼图克图捐马250匹，喀喇沁札萨克克兴额捐马150匹。战争末期，清政府更增调察哈尔蒙古骑兵2,000名到天津防守，调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三盟蒙古骑兵3,000名在近口地方驻扎备调。蒙古族各阶层纷纷捐钱支持蒙古族士兵为参加反侵略斗争而出征，如喀喇沁中旗布仁特固斯、张月各捐钱1,000吊，喇嘛希纳瓦捐钱600吊等。^[9]广大蒙古族士兵更是满怀着反侵略的战斗激情走上征途的。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协理台吉旺沁巴拉后来率军回师时，他的儿子、蒙古族爱国诗人古拉兰萨赋了一首题为《祝灭寇班师还》的诗，其中写道：“英寇狂暴侵海边，勒令我父扫狼烟。将士云集晓恩义，旗丁纷聚效忠贤。……旌旗凌空蔽日月，剑戟挥舞天地炫。”^[10]生动地表达了蒙古族人民决心抗击“英寇”的意志。

1856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8年6月在英法联军的武力威胁下，清政府同英法侵略者签订了《天津条约》。但是签约后，英法公使竟摆出一付战胜者的姿态，于1859年6月率英法联军舰队从上海北上，无理坚持要从大沽口登岸到北京交换批准书。英国公使普鲁斯蛮横地宣称：“我一定要使清朝皇帝及其大臣相信：一旦我提出要求，就要把它索取到手，如不顺从我的要求，我已准备凭借武力威胁来索取。”^[11]自6月24日起，英法侵略者更不顾清政府告诉他们从北塘登陆去北京的照会，强行拆

毁中国大沽口的海防工事，武装登陆。

这时驻在大沽口的清军主要是哲里木、昭乌达两盟的蒙古族骑兵二千名和京旗各营官兵二千名，由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亲王僧格林沁统率。僧格林沁本来按清政府指示的“隐忍静伺”的方针，继续“晓谕”英法侵略军最后走北塘，但是英法侵略军置之不理，在6月25日向大沽口炮台猛烈冲锋。侵略者的无端挑衅使大沽口的广大守军“郁怒多时，势难禁遏”^[12]。于是守军实行自卫反击。猛烈的炮战和肉搏战持续一昼夜，结果大沽口守军杀得英法侵略军大败；在美国侵略军的援助下，英法联军才狼狈逃走。

在大沽口战斗中，“我台瞭击敌船，蔑不中者，是以获捷。”英勇善战的蒙汉士兵把侵略者打得“相顾愕眙，心手胥乱。”^[13]特别是蒙古族士兵，为这次胜利的战斗作出了贡献。当时的情况是：“两盟马队，于枪炮如雨之中，往来驰突，连环枪炮，击毙极多。……该官兵复能排列壕沟以外，连番冲击，白昼至夜，鏖战数时之久，击退夷众，力保营盘。实属奋勇图功，不避锋镝，洵为勇敢得力之军。”^[14]

在大沽口守军的反击下，英法联军损失惨重。据西方人的记载，单英国侵略军就是：“六只炮艇被打得不能作战，其中四只被击沉，二十五名水手和六十四名海军陆战队被打死，九十三名水手和二百五十二名海军陆战队受伤，伤之总数是四百三十四人，占登陆军队的半数以上。在重伤之中的有海军司令何伯。”^[15]英法联军败回上海。“向来夷船进黄浦江，各夷船俱放炮迎接，此次并未放炮，亦无动静。”^[16]他们出发时的嚣张气焰被大沽口守军扫除净尽了。

大沽口战斗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中国方面所获得的唯一的一次大胜仗。这个战斗立刻震动了西方，连当时的英国报刊也不得不认为这是“中国人对抗欧洲军队第一次获得了‘大胜’。”^[17]英法侵略者在惨败之余，大肆咆哮要“实行大规模的报复”^[18]。

甚至阿Q式地咒骂赢得了大沽口战斗的反侵略战士是“怯懦的蒙古人”^[19]。但是，真正的怯懦者却正好是在蒙汉骑兵的反击下狼狈溃逃的英法侵略者；蒙古族人民，中华各族人民，他们决不是“怯懦的”，而是无畏的。在大沽口战斗中，他们显示了刚毅的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

1860年8月，英法联军再次进攻北塘——大沽口阵地。守卫北塘——大沽口阵地的广大蒙古族士兵继续进行了抗击侵略者的斗争。“在这次交战中有六七千名蒙古骑兵，对着炮火英勇抵抗。”^[20]但是，由于清政府的妥协投降，僧格林沁在前线又听命于清政府而撤防退却，北塘——大沽口阵地终于失陷了。

两次鸦片战争都是因为清政府的妥协投降而以中国的失败告终。西方列强就是凭借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获得的特权，逐步侵入中国各地的。内蒙古也逐步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上述近代内蒙古社会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内蒙古爆发了一系列蒙汉各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这正是近代中国第一次革命高潮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太平军起义活动的中心在南方；内蒙古远离太平军起义的中心地区，所以没有直接卷入这场伟大的斗争。但是，不断流入内蒙古的内地破产汉族农民，把太平军起义的消息逐渐传到了这里。清政府曾大量调遣内蒙古封建王公的骑兵到南方参加镇压太平军，当时称作为“打南阵”。清朝的忠实走狗僧格林沁及其他反动封建王公，曾积极去“打南阵”。但被迫参加“打南阵”的蒙古族士兵回到内蒙古后，也把太平军革命的消息传播开来。为了“打南阵”，清政府征调内蒙古的大量马匹、银两，这又促进了这里阶级矛盾的加剧。而这个时期内蒙古爆发的一系列反封建斗争，就其性质来说，更是同太平天国起义一致的，都反映了鸦片战争以后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固有矛盾的激化。这里的斗争并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力量。因此，五十

年代到七十年代前期内蒙古人民的反封建斗争构成了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近代中国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中国各族人民反清反封建斗争的一部分。

近代内蒙古最初的反封建斗争恰好发生在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僧格林沁的领地——东部的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以下简称科左后旗）。

十九世纪初，科左后旗的王公开始大量招徕汉族农民开垦，依靠对土地的封建占有权，对汉族佃农进行残酷的剥削。科左后旗王府地局原定租额是每顷东钱三千六百文，但在“夹荒”^[21]这个地区，王府竟硬性规定改为每顷征租五两五钱，这就引起了佃民们的一致反对。从1850年4月起，数千佃民在捐纳候选游击吴保泰和监生王柏龄的领导下拒绝按五两五钱的规定交租，展开了抗租斗争。直到1851年10月，清朝派官吏再三“开导”、催缴，但佃民们“众口一词，……坚以三千六百之数为准”^[22]。佃民们推举的代表到奉天府去具呈请愿，被清政府扣押；于是佃民们更提出：“非将在省圈禁之人放回，即三千六百之数亦不能交”^[23]。清朝官吏“开导”无效，便调兵对抗租农民实行武装镇压。广大佃民纷纷武装起来进行抵抗。这次抗租斗争的领导人吴保泰、王柏龄都是地主，他们同样要向王府地局纳租，同王府有一定矛盾，因而在抗租斗争初期他们可以与广大佃农一起斗争。但当斗争进一步发展成为武装斗争时，他们却显得软弱无力。抗租斗争很快在清军镇压下遭到失败。吴保泰、王柏龄等领导人都被捕，王柏龄被杀，吴保泰被监禁。

科左后旗佃农依旧被沉重的地租剥削压得透不过气来。两年后，即1853年又有孟玉龄等几百人到清朝地方衙门昌图厅去“呈恳减租”。1854年11月间，曾参加吴保泰等抗租斗争的霍义在外地流亡后回来，孟玉龄等便同霍义取得联系，发动更多的佃民再次掀起了抗租斗争。他们决定：“若地局来人催租，令其减价，如不减价，拒抗莫交。”^[24] 1854年这一年，佃民们没有向地局